

两汉哲学新探

于首奎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两汉哲学新探

• 于首奎 •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汪 漪

封面设计：李显陵

技术设计：古 蓉

两汉哲学新探

于首奎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(成都盐道街3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省邮电印制厂印刷

开本 $850 \times 1168mm$ 1/32印张9.25插页4字数205千

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220-00248-3/B·19 印数：1-2610

定价：3.00元

目 录

贾谊评传·····	1
略论《淮南子》的哲学思想·····	33
试论《淮南子》的宇宙观·····	42
论《淮南子》的朴素辩证法·····	54
《淮南子》社会历史观初探·····	65
《淮南子》中朴素的唯物史观·····	75
《淮南子》无神论思想初探·····	86
董仲舒评传·····	102
对董仲舒哲学思想评价的商榷·····	142
试论董仲舒哲学的“气”·····	151
董仲舒的“元”就是“元气”吗?·····	161
董仲舒的“天人感应”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吗?·····	164
《白虎通》评述·····	174
《白虎通》神学宇宙观批判·····	234
《白虎通》封建伦理观批判·····	246
郑玄评传·····	261

贾谊评传

一 贾谊的生平与著作

贾谊生于汉高祖刘邦七年(公元前200年),卒于汉文帝刘恒前元十二年(公元前168年),洛阳(今河南洛阳)人,是西汉初期唯物主义哲学家、杰出的政治家。他的一生只有短短的33年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:

(一)从贾谊出生到他出任长沙王太傅前(公元前200年—公元前177年)^①,是他生平的第一阶段。

关于贾谊的先世,家庭状况,目前不见史料记载,只知洛阳城东门里有贾太傅祠,其中奉祀的就是贾谊。贾谊从小学习刻苦努力,孜孜不倦。少年时,即跟着荀况的弟子、秦朝的博士张苍学习《左氏春秋》。唐人陆德明著《经典释文序录》中记有:

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,申传卫人吴起,起传其子期,期

^① 学术界也有人认为贾谊出任长沙太守,是在公元前176年。

传楚人铎椒，椒传赵人虞卿，卿传同郡荀卿名况，况传武威张苍，苍传洛阳贾谊……。

这说明，贾谊从小即受到名师的指教，后来他还作过《左传》的注释，但失传了。贾谊博览群书，熟悉先秦各家学说，掌握大量历史文献，对先秦道家学说更有研究，在他青少年时期，便写有《道德说》、《道术》等论著，阐发哲学思想。18岁时，以博学多才闻名于全郡。

贾谊，洛阳人也，年十八，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。

（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）

洛阳，汉时属于河南郡，当时的河南郡守是吴公，由于贾谊“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”，遂受到吴公的器重，把他“召置门下”，作为门客，并很宠爱他。“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，召置门下，甚幸爱”（同上）。吴公是汝南郡上蔡人，曾就学于荀况的弟子李斯，所以他对先秦的古典文献、诸子百家学说都很有研究，贾谊在他门下作门客数年，肯定受到很大教益。门客平时本来没有什么具体工作，这时贾谊主要还是致力于学术问题的探讨，同时也研究一些社会现实问题。贾谊的《劝学》篇，就是这时为对其弟子门人传授《左氏春秋》，勉励他们努力学习而写的。他后来撰写了大批政治论文，向文帝提出了一些政治性的建议，都与他这时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努力研究分不开。

吴公管辖、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，社会十分安定。文帝继位后，立即把吴公调到中央，提升为总管全国司法的长官——廷尉。

文帝初立，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，故与李斯同邑，而尝学事焉，征以为廷尉。（同上）

贾谊也随着吴公调到中央。吴公把贾谊推荐给文帝，文帝便召他为博士，“廷尉乃言谊年少，颇通诸家之书。文帝召以为博士。”（同上）从此，贾谊步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。当时，贾谊仅20余岁，班固曾说：“贾生矫矫，弱冠登朝。”（《汉书·叙传下》）但每当文帝命令博士们讨论一些问题时，很多年纪比他大的博士，一时讲不出什么来，贾谊却滔滔不绝，对答如流，博士们都觉得他讲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以为贾谊很有才能，这使文帝很高兴，在一年之中就破格把贾谊提拔为中大夫（比博士更高的顾问官）。

是时，谊年二十余，最为少。每召令议下，诸老先生未能言，谊尽为之对，人人各如其意所出。诸生于是以为能。文帝说（悦）之，超迁，岁中至太中大夫。（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）

为了巩固西汉王朝“天下初定”的形势，贾谊主张建立一套制度，以维护封建秩序：

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，天下和洽，宜当改正朔，易服色制度，定官名，兴礼乐，……然诸法令所更定，及列侯就国，其说皆谊发之。（同上）

同时，贾谊还写了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》、《无蓄》等，多次上书文帝，建议发展生产，加强贮蓄，预防荒年，确保百姓安居乐

业。文帝遂与一些大臣议贾谊“任公卿之位。”但由于一批元老、功臣周勃、灌婴、张相等，因循守旧，自恃有功，看不起年青有为的贾谊，诽谤他“专欲擅权”。于是贾谊不但没有得到重用，反而被疏远，终于调离中央，任长沙王吴差的太傅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是这样的说：

天子（文帝——引者注）议以谊任公卿之位，绌（音匠，即绌侯周勃）、灌（灌婴）、东阳侯（张相等）、冯敬之属尽害之，乃毁谊曰：“洛阳之人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。”于是天子后亦疏之，不用其议，以谊为长沙王太傅。

但关于贾谊的失宠也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即认为在贾谊调离中央时，绌侯周勃已经免去了丞相的职务，“免就国”，灌婴已死去^①，他们在京都，或在世时，可能对贾谊有些看不起，对他有所诽谤，但贾谊的调离中央并非因此，而是由于文帝听了邓通的谗言的结果。后汉人应劭在他著的《风俗通义》中，就是这样说的。他说：

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，谊又恶通为人，数廷讥之，由是疏远，迁为长沙太傅。既之官内不自得，及渡湘水投吊书曰：“闾茸尊显，佞谀得志，以哀屈原离谗邪之咎。亦因自伤为邓通等所愆（诉）也。”

^① 有人认为贾谊是公元前176年任长沙太傅的，灌婴正是这一年死去的。周勃是在这前一年“免就国”的。

从贾谊去长沙的时间，和邓通与文帝的特殊关系^①，以及后来（公元前173年）文帝征见贾谊时虽赞其有才仍不见用等等情况分析，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是比较可信的。

（二）贾谊生平的第二阶段（公元前177年—公元前168年），从他出任长沙王太傅起，到他33岁病卒止。前后共9年。

长沙诸侯王国，是当时唯一存在的仅有两万五千户的一个异姓诸侯王国。在贾谊去长沙的途中，经过湘水，使他想起了爱国诗人屈原，这位诗人因为坚持主张楚国进行改革，被奴隶主贵族谗害，投汨罗江而死。贾谊回首往事，无限感慨，写下了悲愤沉郁的《吊屈原赋》，他以崇敬的心情，悼念屈原，同时借以自喻，愤怒地控诉了排挤、打击自己的昏庸大臣和邓通之流。指责他们“阉茸尊显兮，佞谀得意”（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）。是卑贱无能反而地位显赫，阿谀奉承反而自鸣得意；表示了对他们的蔑视和愤恨。

贾谊到长沙后，并没有悲观消沉，他仍积极关心西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。在去长沙的第二年（公元前175年），他即针对当时私人铸钱造成通货膨胀，影响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情况，向文帝上《谏铸钱疏》，并写了《铸钱》、《铜布》等论文，坚决主张由国家统一铸钱。

在贾谊去长沙的第三年，有一天一只鹏鸟突然飞到他的住址。鹏鸟就是猫头鹰，按照迷信的说法，飞到谁家，谁家的主人就

① 《汉书·佞幸传》：“邓通蜀郡南安人也，文帝尝梦欲上天，不能。有一黄头郎推上天，顾见其衣尻带后穿，觉而之渐台，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，见邓通，其衣后穿，梦中所见也。……文帝甚悦，尊幸之。……文帝时，因如通家游戏，然通无他技能，不能有所荐达，独自谨身以媚上而已，……文帝尝病痼，邓通常为上嗽吮之，……及文帝崩景帝立，邓通免家居。”

要遭到不幸。鹏鸟的飞临，引起贾谊对世界变化和人世沧桑的一番感慨，遂写了一篇《鹏鸟赋》，关于他写作这篇赋的动机，《汉书》本传说：

谊为长沙傅三年，有服飞入谊舍^①，止于坐隅，服似鹄，不祥鸟也。谊既以适居长沙，长沙卑湿，谊自伤悼，以为寿不得长，乃为赋以自广。

“为赋以自广”的说法是十分恰当的。正是通过该赋，贾谊言简意赅地全面抒发了他对宇宙的看法，成为研究贾谊思想的重要材料。文帝前元七年（公元前173年），文帝想念贾谊，又把他从长沙召回中央。在贾谊入见时，文帝正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前殿坐着，文帝对鬼神的问题有些疑问，于是就和贾谊谈起鬼神的事。贾谊对文帝谈了些对鬼神的见解，文帝感到很新鲜，表示莫大的兴趣，竟至移座接近贾谊，谈话到半夜方止。最后文帝感叹不已地说：

吾久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过之，今不及也。（同上）

但是文帝并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，只是把他分派到梁王那儿当太傅。后来，唐代诗人李商隐曾作诗指责文帝昏庸，并为贾谊的政治抱负和才华未能得到施展而惋惜：

宣室求贤访逐臣，贾生才调更无伦。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（《唐诗三百首详析》）

梁怀王刘揖，又名刘胜，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。他召任贾谊

^① 服，通“鹄（音服）”。

作他的太傅，毕竟也表明文帝对贾谊的赏识。在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时，中央政权和地方诸侯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、激化。济北王刘兴居，淮南王刘长接连叛乱，北方匈奴也乘机侵扰。贾谊针对这种严重危机，接连多次上疏文帝。其中最重要的，也是最著名的就是文帝前元七年（公元前173年）的上疏《治安策》（也叫《陈政事疏》）。在《治安策》里，贾谊全面地分析了西汉初期，汉王朝中央政权面临的一系列矛盾，并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各方面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措施。它对西汉王朝，和汉以后一些封建王朝制定政策，都有重大影响。在这里，充分体现了青年政治家贾谊的政治才华。

文帝前元八年（公元前172年），文帝分封淮南厉王刘长的4个儿子刘勃、刘喜、刘安、刘赐为列侯。贾谊又上《谏淮南王诸子疏》极力劝阻。他说明了分封他们的危害，指出这是“假贼兵以虎翼”的愚蠢做法。但文帝不听。后来，汉武帝时刘安与其弟刘赐阴谋反叛，证实了贾谊的预见是正确的。

文帝前元十一年（公元前169年），梁怀王刘揖，因上朝时不慎坠马身死。梁怀王无后，照例应将其国取消。但贾谊这时却权衡利弊，给文帝上《诸封建子弟疏》，建议文帝利用这一时机，调整一下诸侯的封地，从而加强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斗争的有利条件。他说：

臣之愚计，愿以淮南地以益淮阳，而为梁王立后，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；不可者，可徙代王而都睢阳，梁起于新栖以北著之河，淮阳包陈以南捷之江。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，破胆而不敢谋。梁足以捍齐、赵，淮阳足以

禁吴、楚，陛下高枕，终亡山东之忧矣。此二世之利也。
(《汉书·贾谊传》)

这是说，加强文帝两个儿子淮阳王刘武和代王刘参的势力和地位，为梁王揖立继承人。或者，把代王参迁到梁国来，扩大他们的封地，使两个封国连成一大片。这样梁王可以抵御齐、赵，淮阳王可以控制吴、楚，文帝就可以消除山东（指华山以东）地区的忧患了。文帝采纳了贾谊的这一建议，迁淮阳王武为梁王，另迁城阳王喜为淮南王（代王未动）。后来，景帝三年（公元前154年），吴、楚、齐、赵等联合叛乱，向西进攻西安，梁王武坚决抵御，保卫了汉王朝的中央统治。说明贾谊这一建议起了积极作用。

梁王刘揖死后，贾谊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职责，经常啼哭，过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即在文帝十二年（公元前168年），他忧郁而死。年仅33岁。

关于贾谊的著作，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，在《秦始皇本纪》、《陈涉世家》里收录了贾谊的《过秦论》，《屈原贾生列传》中收录了贾谊的《吊屈原赋》、《鹏鸟赋》等。后来，刘向整理经传诸子诗赋，才比较完备地把贾谊的著作编纂成书，即《贾谊新书》或称《贾子》。东汉班固写《汉书》时，他采用《新书》中大批材料，写成了《贾谊传》、《食货志》、《礼乐志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有：“贾谊五十八篇”，贾谊赋七篇”。这里所说的“贾谊五十八篇”，大概就是刘向整理编纂的《贾谊新书》。

在南宋时期，贾谊的书出现刻本，卢文弨校《新书》时，就参考过两种宋本，即所谓“建本”（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印）和

“谭本”（宋淳祐八年长沙刻，即从淳熙八年程漕使本重雕者，题《贾子》）。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刻本是明刻本。不过从卢文弨《新书》序言中可以知道，明刻本是仿宋本刻的。到了清朝末年，共刻了大约有20多种，书名题为《贾子》或《新书》，但它们的内容系统都大同小异，即基本上是一致的。

关于贾谊《新书》的真伪问题，最早对《新书》提出怀疑的是宋人陈振孙，他在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中斷言《新书》中凡是《汉书》没有引用的，都是“书辄浅驳不足观，此决非谊本书也”。《四库提要》也说：“其书不全真”，认为它是后人割裂《汉书》中的引文而编凑的：“好事者本取本传所有诸篇，离析其文，各为标目，以足五十八篇之数，故恒订至此。”姚鼐更武断地说《新书》完全是伪书：“贾生书不传久矣，世所云有《新书》者，妄人伪为者耳。”（《姚鼐传全集》）《新书》真伪问题，尚可讨论。但见《汉书·贾谊传》中，班固明明写着：

凡所著述五十八篇，掇其切于世事者，著于传云。

也就是说，班固自称《汉书·贾谊传》中，引用的有关贾谊的材料，是从《新书》中摘录出来的“切于世事”的一部分。如果没有更可靠的材料来否定上述《汉书》中的说法，则陈振孙、《四库提要》和姚鼐的上述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。

总之，我们认为贾谊的《新书》基本上保持了刘向编辑的原来面貌，至于少数篇章，可能遭到后人窜改、割裂，或在长期流传中有些篇散失、残缺，又有人加以整理，这是古书一般都存在的问题。但该书仍不失作为研究贾谊问题的最基本的材料。

对于《新书》的注释，有何孟春的《贾太傅新书订注》本，

清人卢文弨校注的《贾谊新书》，和清人王耕心的《贾子次诂》。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贾谊集》，对贾谊的有关资料收集比较齐全，并进行了校点，较有参考价值。

二 贾谊的社会政治思想

西汉初期，由于经过秦末汉初长期的战乱，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，社会秩序十分混乱，人民生活极端困苦。这时，汉王朝主要忙于对异姓诸侯王的平定，巩固中央统治。对于恢复生产、维护社会秩序，虽然做了一些工作，但一直到文帝继位前期，仍然没有显著成效。贾谊曾提醒文帝说：

今汉兴三十年矣，而天下愈屈，食至寡也，陛下不省耶？未获年，富人不得，贫民且饥；天时不收，请卖爵鬻子，既或闻耳。曩顷不雨，令人寒心，一雨尔，虑若更生。

天下无蓄若此，甚极也……。《《贾谊集·忧民》，以下引《贾谊集》只注篇名）

文帝本人也承认：

十年于今，而野不加辟，岁一不登，民有饥色，……且吾农民甚苦，而吏莫之省，将何以劝焉。《《汉书·文帝纪》》）

这说明，当时的情况非常严重，汉朝虽然建国三十多年了，但由于封建统治者忙于争权夺利的斗争，对于劳动人民的生活置之不

顾，而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过着卖儿卖女的贫困生活。农民的革命烈火，仍在各地燃烧着，“奸诈盗贼并起”（《瑰玮》），使汉王朝有重蹈亡秦覆辙的危险。贾谊面对这种形势大声疾呼：

。 曩之为秦者，今转而为汉矣！（《治安策》）

为了使汉王朝的政权得到巩固，免于重蹈亡秦覆辙的危险，贾谊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，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：

闻之于政也，民无不为本也。国以为本，君以为本，吏以为本。故国以民为安危，君以民为威侮，吏以民为贵贱。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。（《大政上》）

在贾谊看来，一个国家的存亡，决定于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：

故夫诸侯者，士民皆爱之，则其国必兴矣；士民皆苦之，则国必亡矣。故夫士民者，国家之所树而诸侯之本也，不可轻也。（《大政上》）

民所以为君本，是因为贾谊认为，民，人多势重，他们是不可抗拒的力量，是“不可欺”的：

夫民者，万世之本也，不可欺。……故夫民者，大族也，民不可不畏也。故夫民者，多力而不可适也。呜呼！戒之哉！戒之哉！与民为敌者，民必胜之。（《大政上》）

那么，怎样以民为本呢？贾谊认为以民为本，~~民之所归~~，
“夫民者，弗爱则弗附”（《大政下》）。要“与民以附”

民以财”，只有如此，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：

故君子之贵也，与民以福，故士民贵之；故君之富也，
与民以财，故士民乐之。故君子富贵也，至于子孙而
衰，则士民皆曰：“何君子之道衰之数也？”（《大政上》）

一个君主是否尊贵，在贾谊看来，不是看他的称号、地位，而是看他能否得到人民拥护。他说：

故纣自谓天王也，桀自谓天子也，已灭之后，民以相骂
也。以此观之，则位不足以为尊，而号不足以为荣矣。（同
上）

判断一个官吏的功过、忠奸，贾谊也主张根据是否“爱民”、“富民”为准则：

故夫为人臣者，以富乐民为功，以贫苦民为罪。故君以
知贤为明，吏以爱民为忠。（同上）

贾谊还说：

明上选吏焉，必使民与焉。故士民誉之，则明上察之，
见归而举之；故士民苦之，则明上察之，见非而去之。故王
者取吏不妄，必使民唱，然后和之。故夫民者，吏之程也，
察吏于民，然后随之。夫民至卑也，使之取吏焉，必取其爱
焉。故十人爱之有归，则十人之吏也，百人爱之有归，则百
人之吏也，……故万人之吏，选卿相焉。（《大政下》）

这就是说，人民的舆论，是明主任免官吏的尺度，拥护的人少，

就叫他做小官吏，拥护的人多，就叫他允任大官吏；人民反对的就罢免。总之，在贾谊看来，以民为本，就是要处处事事以人民有利为准则，以人民的爱、恶为根据。

贾谊从他的民本思想出发，主张对人民施行德教，反对“繁法严刑”。他说：

道之以德教者，德教洽而民气乐；驱之以法令者，法令极而民风哀。哀乐之感，祸福之应也。（《治安策》）

贾谊批驳那些宣扬“礼谊之不如法令，教化之不如刑罚”者说：“人主胡不引殷、周、秦事以观之也？”（同上）“汤、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，而德泽洽，禽兽草木广裕，德被蛮貊四夷，累子孙数十世，此天下所共闻也。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，……祸几及身，子孙诛绝，此天下之所共见也。”（同上）这就是说，在贾谊看来，殷、周和秦王朝的历史说明，只有施行德教，才能使汉王朝的统治，长治久安。

在经济领域里，贾谊积极主张重本抑末，对农民要“轻赋少事”；反对民间铸钱。因为，当时国家允许私人铸钱。一些富人大贾即招集大批农民进行采铜铸钱，遂使这些农民放弃了农业生产。“铜布于下，采铜者弃其田畴，家铸者损其农事，谷不为则邻于饥。”（《铜布》）富人大贾再用谋取的暴利大肆掠夺农民的土地，使农民失去土地逃亡四方。贾谊针对这一情况指出：

今背本而趋末，食者甚众，是天下之大残也。（《论积贮疏》）

在《铜布》篇里，贾谊提出由国家铸钱，和垄断铜的生产，从根